

## 風摧百合殊堪哀

◎ 王 鋒

40年代的《解放日報》已然紙頁泛黃，氣味嗆人。然而，泛黃的紙頁卻掩不住曾經鮮活的生命和曾經真實可感的歷史。我細細地咀嚼著它的文字，我知道，這些冷冷的鉛字背後，是一個痛苦地思考和掙扎著的靈魂，一個熱情而又倔強的靈魂。這靈魂的所有者叫王實味——一個我們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。之所以說熟悉，是因為互聯網上到處都有他的名字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「王實味」已然成了「民主」的代名詞。而之所以說陌生，又是因為那些動不動就拿王實味說事兒的人，沒有幾個能真正地走近他，理解他。

王實味是一個革命者，一個為「革命」所殺的革命者。他死於1947年7月1日——那一天正好是黨的生日。關於他的死，余傑在〈王實味：前文革時代的祭品〉中寫道：

1947年7月，山西興縣。一名被押綁的中年知識份子被武裝人員押送到破廟後的僻靜處，大刀掄起，刀落頭落，鮮血狂噴。之後，屍首被扔進一口枯井，倒入泥土掩埋，從此消失……這位被殺戮的書生，是前文革時代的祭品。他的名字叫王實味。他的死開啟了一幕悲劇，一幕20世紀下半葉知識人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劇。<sup>1</sup>

他的死是沉重的——不僅因為開啟了知識人的悲劇之幕，還因為他到死還頂著三頂沉重的「帽子」——「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」、「暗藏的國民黨探子、特務」及「反黨五人集團頭子」。

今年的7月1日，是王實味橫死60周年的祭日。60年的歷史，湮沒了多少的人和事，那些曾經掄著大棒必欲置王實味於死地而後快的人，如今安在？又有多少人能記起他們？而作為思想者的王實味以及他的思想，卻永久地停留在人們的視野中，頭腦裏——歷史是公正的，它總是有足夠的耐性來讓人們反思。在這裏，我不想就王實味之死做過多的評價——歷史自會有其公正的評價。我只想客觀地敘述——關於他以及他的思想，權作一種紀念吧。

王實味，原名思禕，字書翰，河南潢川人，生於1906年。他的父親是前清舉人，在父親的指導下，他從小便熟讀四書五經，有著深厚的國學根基。他1923年考入河南留美預備學校，在那裏，他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功底，為他以後從事翻譯工作奠定了基礎。一年後，由於學校停辦，更由於經濟困難，他到郵局做了一名郵務生。在此期間，他堅持閱讀《創造週刊》、《東方雜誌》等新文化刊物。1925年，他考入北京大學文預科，更進一步地接受了新文化的浸潤和洗禮。在北大，他建立起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——這一信仰伴隨其終生，並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兩年後，又是由於經濟困難，他再次被迫輟學，他接受學校教育的歷史也從此終止。他早期的家庭教育與以後的學校教育，使他的文化背景具有了兩種鮮明的底色：傳統的儒家思想與現代新文化的啟蒙思想。這兩種思想對他以後的影響極大，他正是在這兩種思想的驅使下最終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的。

在二十年代，為了謀生，為了排遣苦悶，更為了理想與信仰，王實味開始了文學創作。他先後寫下了〈休息〉、〈楊五奶奶〉、〈毀滅的精神〉、〈陳老四的故事〉、〈小長兒與罐頭荔枝〉等小說。在這些作品中，王實味堅持了新文化的啟蒙與批判的精神，他「著力於揭示宗法制農村的現實中『老中國兒女』的精神陳腐，挖掘國民性的愚妄和落後」。<sup>2</sup>

由於文學創作收入不穩定，王實味生活很是拮据，為了養家糊口，他在三十年代開始翻譯外國作品。在短短的幾年裏，他先後譯出了霍普特曼的《珊拿的邪教徒》、都德的《薩芙》、高爾斯華綏的《福爾賽世家》、奧尼爾的《奇異的插曲》、哈代的《還鄉》等世界名著。他的大多數譯著被編入「世界文學名著」和「世界文學全集」，由商務印書館或中華書局出版，字數達到一百多萬。在此期間，除了譯書，他還做過小職員，當過中學老師，艱難的生活迫使他四處輾轉。三十年代正是國難日重之時，王實味作為一名愛國青年，更作為一個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者，始終關注著革命的形勢。1937年7月7日，「盧溝橋事變」爆發，日本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。國民黨政府，作為抗戰的領導者，不僅消極抗戰，而且還極力壓制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抗日活動，這使王實味異常悲憤，他毅然決定離開這骯髒的國統區，奔赴光明的延安。

1937年10月，王實味到達延安。他一開始作為學員在陝公（陝北公學）學習，後被調入出版局，不久又被調到馬列學院編譯室，從事馬恩列原著的翻譯工作。他在編譯室呆了將近四年，在這不長的時間裏，他翻譯出了近兩百萬字的理論書稿。如果說王實味一直老老實實地埋頭做翻譯的話，或許他的人生軌跡會是另外一個樣子。但歷史不容許假設，它總是按照自己內在的邏輯發展著。在延安呆的時間久了，他便逐漸發現了延安的一些不被人注意的「黑暗」。這時，王實味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，特別是那種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責任感和「以道馭勢」的使命感，開始在他的身上發生作用了。他頭腦中根深蒂固的「啟蒙」意識也開始被再次啟動。他於1942年3月先後發表了〈政治家、藝術家〉、〈野百合花〉等雜文，尖銳地指出延安存在的「首長至上」、「缺乏階級友愛」、「等級制度嚴重」等問題，並且明確提出了「改造人的靈魂」的思想啟蒙的目標。在3月18日的整檢動員大會上，他還帶頭反對羅邁的「家長制作風」<sup>3</sup>，鬧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「民主」風波。

槍打出頭鳥。王實味的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，在一次挑燈讀了王實味的文章後，毛澤東一錘定音：「思想鬥爭有目標了」<sup>4</sup>從此以後，便開始了對王實味無休止地批判，王實味也開始由「同志」變成「託派」，再變成「國民黨探子、特務」，最後又變成「反黨五人集團頭子」。基於他的「罪惡」，中研院黨委於1942年10月23日宣佈開除王實味的黨籍。同年年底，王實味被關押。王實味被康生主持的中央社會部關押了將近五年，這期間，王實味一直被作為「失足者」而接受「搶救」，直到1947年4月，他被轉移到位於興縣城郊的晉綏公安局的一個看守所。在看守所，他被視為「重犯」而受到嚴加看管。6月12日，王實味所在的看守所遭到炮彈襲擊，需立即轉移，晉綏公安局於是寫信請示中社部該如何處理王實味。中社部很快回信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。7月1日夜，王實味被砍殺於一口枯井。

王實味死了，他死於「文禍」——他那些犀利的雜文，尤其是〈野百合花〉為他招來了殺身之禍。他的言辭太過激烈，太過刻薄，他的「立場是根本錯誤的」，他對人民採取了「冷嘲暗箭」的方法。王實味又不僅僅死于「文禍」，他的死，如許多學者所揭示的，更多的是一種被選擇或者說被安排的死。毛澤東是善於抓典型的，他說整風不僅需要好的典型，也需要壞的典型，而王實味，就不幸成了這種壞的典型。毛澤東需要利用這個壞典型來教育廣大的知識份子，擊退「暴露黑暗」的雜文風潮。更重要的是，毛需要用「殺雞儆猴」的方式來樹

立他的個人權威，同時將所有的知識份子以及他們的思想，統統納入他苦心構建的「新民主主義文化」的意識形態軌道中來。對於這種「安排」，我曾經寫過一首小打油詩：「風摧百合殊堪哀，熱血一腔灑祭台。殺身豈因文禍起？楊家嶺裏有安排。」「藝術家」沒能改造「政治家」的靈魂，反而被「政治家」毀滅性地改造了身體，這種頗具吊詭意味的結局，王實味在寫作〈政治家、藝術家〉的時候，可曾有所預料？

當然，王實味的死還有其他很多方面的原因。比如他的性格因素，他狂傲、孤僻、偏執，喜怒易形於色。他在去延安以前就因為自己「不可愛」的個性而多次丟掉飯碗。到延安以後，他以為在自己家裏對「家人」不必客套，因此依然「直言不諱」。這使他的人際關係很糟，很多人後來回憶起他的時候都認為他「不可愛」。應該說，他的性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自身悲劇的催化劑。比如康生的插手。康生一生以整人為業，延安時期，建國初期，直至文革，很多知識份子都直接被康生整死。王實味之死——當然也包括他的三頂大帽子，很大程度上也是拜康生所賜。再比如王實味的同事與朋友或被迫或自覺的落井下石。這也是對王實味的致命一擊。當然，稍後的歷史即將證明，他們在對王實味致命一擊的同時，也對自己發出了致命一擊。

這裏還有一點我想著重指出。這就是「自由」話語在延安的遭遇問題。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，「自由」與「民主」、「科學」等話語一樣，受到知識份子的追捧，一時成為強勢的主流話語。當然，這裏的「自由」，既有哲學本體意義上的自由，也有政治學意義上的自由；既有群體意義上的自由，又有個體意義上的自由。受過五四新文化洗禮的年輕人，大多還是堅持「自由」理念的——他們也有堅持「自由」的條件：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屬於某個組織、某個單位，也就是說，他們的身份是獨立的。他們可以獨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，既可以批判，也可以歌頌，既可以談抗戰，也可以談風月。雖然在國統區也有圖書審查機構，但國民黨的審查，更多的是針對魯迅這樣的名家，對於一般知識份子而言，他們還是有著相當的「自由」的。因此，在奔赴延安的時候，很多人還是想著像在國統區那樣能夠「自由笑罵」的。何其芳在〈一個平常的故事〉中就引用了倍納特·蕭的一句話：「請你們容許我仍然保持批評的自由」<sup>5</sup>。

然而，延安卻是「自由」的「禁區」。毛澤東並不喜歡「自由」，他認為「自由」會使組織渙散，會破壞革命的合力。1937年9月7日，毛澤東作了著名的〈反對自由主義〉的演講，在這篇演講中，毛澤東將「自由」與「放任」、「無組織無紀律」等同起來，他完全在傳統的意義上使用「自由」一詞，通過對「自由」含義的巧妙置換，毛徹底否定了「自由」在延安存在的合理性。當然，這種對「自由」的否定，在當時是有其合理性的，因為當時的延安，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政治環境，都是十分惡劣的，在這樣的環境中，「中共只有依靠超強的組織集中才能更好的生存」<sup>6</sup>。為了彌合「自由」與「組織」之間的張力，毛決定將知識份子「組織化」、「體制化」，使他們變成「公家人」。於是，知識份子到延安不久就會被編入「陝公」、「抗大」、「魯藝」、「邊區文協」等組織或機構。他們不再是自由寫作者，他們變成了「幹部」，變成了「單位人」。隨之發生變化的是他們的作品產生與傳播機制：決定他們的作品產生與傳播的不再是「文學市場」，而是「政治需要」。而「政治需要」又是由「人民」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由「人民」的代表者「黨」說了算的。「黨」需要你寫甚麼你就要寫甚麼，「黨」不需要你寫的你絕對不能寫。這是「遊戲規則」，王實味破壞了「遊戲規則」，而且還理直氣壯，「不知悔改」。所以他要為他的行為付出代價，所以他得死。

王實味死了，但對他的批判卻沒有因此而停止。1958年1月26日，《文藝報》第二期刊出〈再批判〉特輯，毛澤東親自修改了編者按，他說：

再批判甚麼呢？王實味的〈野百合花〉，丁玲的〈三八節有感〉，蕭軍的〈論同志的「愛」與「耐」〉，羅烽的〈還是雜文時代〉，艾青的〈瞭解作家，尊重作家〉，還有別的幾篇……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……謝謝丁玲、王實味等人的勞作，毒草變成了肥料，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……<sup>7</sup>

王實味的「罪人」身份再次得以確認。因此，王實味的三頂大帽子在毛澤東時代始終沒有被摘掉。

從他死後的第35年，也就是1982年開始，他的三頂大帽子才由三個不同的部門以不同的方式摘掉。1982年2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的〈關於潘芳、宗錚、陳傳鋼、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謂「五人反黨集團」問題的平反決定〉否定了「五人反黨集團」的存在。1986年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《毛澤東著作選讀》的「注釋486」解釋說，王實味「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、特務一事，據查，不能成立。」<sup>8</sup>1991年2月，公安部正式發佈〈關於王實味同志託派問題的復查決定〉，摘掉了王實味頭上的最後一頂「託派」的帽子。在多年後，冤案終獲平反，雖然遲了，但多少還會讓人感到些許的欣慰。然而，在欣慰的同時，我卻感到一絲彘扭，甚至悲哀。一個鮮活的生命，最終換來的只是一頁甚至一角薄紙，更可悲的是，在這一頁甚至一角薄紙上的文字，它們是如此的乾癟，沒有賠償，沒有道歉，沒有懺悔，沒有反思，我總感覺這不像是「平反」，更像是「特赦」或者「恩賜」。這是王實味的悲哀呢，還是我們這個國家、這個民族的悲哀呢？文章的結尾，我想抄錄〈野百合花〉中的一段話，讓它來時時警醒我們吧：

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從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，生活的力量和戰鬥的力量。這次偶然想到她，使我決心要寫一些雜文。野百合花就是它們底總標題。這有兩方面的含義：第一，這種花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，用以獻給那聖潔的影子；其次，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著鱗狀球莖，吃起來味雖略帶苦澀，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，但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——未知確否。<sup>9</sup>

## 註釋

- 1 余杰：〈王實味：前文革時代的祭品〉，《鐵屋中的吶喊》（北京：中國工商聯合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156。
- 2 黃昌勇：《王實味傳》（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41。
- 3 王實味語，係針對羅邁講話中的兩點決議意見而提出，兩點決議即「院長、秘書長及各室主任應該是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當然委員」、「出壁報，必須有組織的進行，共產黨員在黨內不應匿名」。
- 4 李維漢：《回憶與研究》，下冊（北京：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483。
- 5 何其芳：〈一個平常的故事〉，《何其芳文集》第2卷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），頁223。
- 6 胡其柱：〈晚晴民國「自由」詞義衍變考略〉，未刊稿。
- 7 《文藝報》，1958年1月26日。

- 8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：《毛澤東著作選讀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6，頁836
- 9 《解放日報》，1942年3月13日。

王 鋒 山東省沂源縣人，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社會史與當代中國史。

---

《二十一世紀》(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) 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六十六期 2007年9月30日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於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六十六期（2007年9月30日）首發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，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。